



5

制图：安宁
版式设计：纪安静
责任编辑：高莉
执行主编：张敬东

2026年
6月5日
星期五

内蒙古日报

文物说



【自白】

千载风霜容未改

□本报记者 高莉

大家好，我是一枚铜饰牌，诞生于东汉时期鲜卑工匠之手。我的整体造型像马蹄，长9厘米，宽5.5厘米，身体上浮雕着一匹昂首奔腾的翼马，这是拓跋鲜卑的图腾。我伴随主人在草原上驰骋，见证了部落的迁徙与征战。

今天的我，虽然跨越了近两千年的岁月，却依旧轮廓清晰、纹饰生动，是古代金属铸造与鎏金工艺结合的妙绝之笔。

我的主要材质是铜，整体采用范铸工艺一体成型，这是当时北方草原最成熟的金属铸造技法。工匠先依照设计塑造出完整的模具，将熔化的铜液缓缓注入范腔，冷却脱模后，便形成了我的本体，他又将我的边角打磨圆润。

最见巧思的是我身上的翼马纹样，这可不是后期雕琢，而是在制范时便精准刻画出来，将天马的矫健姿态一次性铸出，由此可见，制作我的工匠有多么高超的塑形功底。

铜胎成型后，便是我身上最亮眼的工序——鎏金，这也是我历经千年仍有金属光泽的核心技艺。古代鎏金又称火镀金，工序繁复，对工匠技艺要求极高。工匠先把黄金与水银按比例融合，制成银白色的金汞合金，也就是金泥，再把金泥均匀涂抹在我的铜质表面，反复擦拭，让金泥紧密附着在每一处纹饰、凹陷与平面上，连翼马羽翼的细小花纹都不曾遗漏。

涂抹完成后，便进入关键的烘烤环节。工匠以炭火低温烘烤器身，随着温度升高，承受慢慢蒸发褪去，纯金便牢牢固结在铜胎表面。这一步考验的是对火候的把控，温度过低，水银无法散尽，鎏金层容易脱落；温度过高，铜胎就会变形，翼马纹饰画得再精致也会受损。水银挥发后，表层金膜略显粗糙，工匠再用玛瑙、兽骨等硬物反复打磨抛光，让金层变得平整光亮，色泽温润醇厚。

大家细看我的表面，鎏金层薄而中、附着力极强，凸起的车马、羽翼轮廓鎏金饱满鲜亮，纹饰凹陷处金层稍薄，自然形成明暗层次，让翼马纹样显得立体而生动，视觉效果浑然天成。不同于简单贴金，古法鎏金让金与铜融为一体，所以即便深埋地下千年，历经水土侵蚀，我的鎏金纹饰依旧没有大面积剥落，依旧泛着当年的华光。

我作为一枚小小的饰牌，浓缩了范铸、鎏金、打磨等多项古代技艺。如今我静静陈列在展柜中，不仅是鲜卑文化的图腾符号，更是古代工匠智慧的实物见证。千年光阴流转，纹饰未改，金辉犹存，古老的技艺也借着我的模样，被后人铭记、传承。

【出圈】内蒙古博物院一级文物



精彩讲解扫码阅读

天马生翼踏长风

□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马颖

鲜卑人走出大兴安岭南迁历经无数艰难险阻，在他们绝望无助时，得到“神马”的引领。因此鲜卑人将马视若神灵，是祥瑞灵兽的代表，图腾的象征。



翼马纹鎏金铜饰牌

长9厘米，宽5.5厘米。

鎏金工艺

鎏金又称火镀金，工序繁复。把黄金与水银按比例融合，制成银白色的金泥，均匀涂抹在铜器表面，反复擦拭，让金泥紧密附着在铜器的每一处纹饰、凹陷与平面上，再加热挥发掉水银，留下光芒耀眼的鎏金器物。

翼马纹鎏金铜饰牌出土于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

扎赉诺尔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成长的摇篮，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存，历史文化传承从未间断。汉代，起源于大兴安岭的拓跋鲜卑走出森林，来到呼伦湖畔，在此生活了200余年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。在内蒙古博物院“融铸北疆”二展厅展柜里，便有一枚出自东汉时期鲜卑人之手的翼马纹鎏金铜饰牌，吸引着无数游客。

饰牌长9厘米，宽5.5厘米，铸造成型，正面铸刻昂首扬尾、肋生双翼、四蹄腾空的飞马，马双目朝天，鼻子上的角向后弯曲，尽显灵动。

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马颖介绍：“这件铜饰牌出土于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达兰鄂罗木河（又称圈河）东岸的坡地上，属于东汉时期鲜卑人的墓地。饰牌上的翼马纹浮雕，轮廓清楚，与东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近似，很明显是受到了东汉文化的影响。”

扎赉诺尔古墓群发现于1959年，从1960年至今，已发现800余座墓葬，累计清理发掘56座，出土文物有金器、陶器、铜器、骨角器、木器、玉器珠饰、漆器等450余件，其中中原文化器物有规矩铜镜、如意纹织锦、漆器、五铢钱等，代表性精品有翼马纹鎏金铜饰牌、三鹿纹金饰牌、骆驼纹金饰牌等，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鲜卑人古墓群之一。

马颖说：“扎赉诺尔古墓群的发现为研究东

汉时期鲜卑族的历史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，从中可反映出鲜卑人在其首领推寅的带领下南迁大泽后，至诃咥再次率部南迁这一百多年中，社会、经济、民俗、文化的面貌，是拓跋鲜卑考古学上的一个标尺。2006年，国务院公布扎赉诺尔古墓群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”

翼马是翼兽之一，翼兽是指原本没有翅膀的动物被加上了翅膀，例如翼虎、翼狮、翼牛、翼马、翼鹿等形象，这种造型是中国古代器物中使用范围最广、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。

鲜卑人留下了许多以马为原型的遗物，这与他们特有的迁徙历程、经济类型、社会背景分不开。传说鲜卑人在南迁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对未来充满未知与茫然时，天降神马，带领他们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出口。

《魏书·序纪》载：“古神兽，其形似马，其声类牛，先行导引，历年乃出，始居匈奴之地。”因此，马被鲜卑人奉若神明、敬奉膜拜，马是他们心中祥瑞灵兽的代表、图腾的象征。

鲜卑人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这一阶段，考古遗存中没有与马相关的遗物、遗迹。到了“大泽”时期，无论是扎赉诺尔墓群，还是拉布大林墓群，墓葬中大都存在牛、马、羊骨，并伴随着与马相关的遗物，翼马纹鎏金铜饰牌便是其中之一。这是由于鲜卑人迁徙至呼伦湖附近后，随着自然环境的优化，经济由游牧经济过渡向

畜牧经济，畜马之风也随之日盛。《后汉书》在《鲜卑传》里记载“兵利马疾，过于匈奴”；《三国志》《魏书·田豫传》有“乃共要，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（中原政权）”的表述，这些都表明马在鲜卑人心中的特殊地位，马匹的数量也是衡量他们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关键。

史料记载：“圣武帝（诃咥）率数万骑于山泽”，力微“控弦上马二十余万”，禄官“控弦骑士四十余万”，郁律“控弦上马将有百万”，“控弦上马”数字的攀升，一方面说明鲜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，另一方面也要与之相匹配的马匹数量。由此可见，鲜卑人已把马匹数量作为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准。

据说鲜卑族慕容部落的吐谷浑游牧青海后，在吸收辽东和甘肃河西地区养马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当地羌人的驯养技艺，以波斯草马为父本，当地土马为母本，进行品种改良，培育出了青海骝（cōng），即毛色青白相间的马。这种马体质结实，步伐灵活敏捷，善走对侧步，是优良的乘用战马，能日行千里，被称为“龙驹”，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。

鲜卑人敬马、爱马，马是他们生产生活、军事战术的核心工具，留下了造型独特、工艺精湛、文化内涵深刻的翼马纹鎏金铜饰牌遗物，成为内蒙古博物院国宝级文物，为我们研究东汉时期鲜卑族经济、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【观点】

合而不同显风华

□马颖

鲜卑是中国古代东胡系统的北方游牧族群之一，没有文字，刻木为信，邑落传信，入主中原后逐渐汉化，用汉字、说汉语。西汉初年，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，部族离散，一支逃往乌桓山（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），称乌桓族；一支逃往鲜卑山，称鲜卑族。

鲜卑人大规模的迁徙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巨大的社会影响，部族自身的生活环境、生产方式、社会结构、思想意识、风俗习惯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随着地域环境的变化，鲜卑人的生产方式由狩猎为主，采集、捕鱼为辅的原始部落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，入主中原后，生产方式又转变为农牧并举，手工业从无到有，甚至达到了一定的高水准，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原及周边部族的经济、政治格局、民族关系等。

政治上，鲜卑与中原虽有征战，但更多是友好往来，他们与朝廷和亲，建立与曹魏的友好关系，接受册封，如拓跋猗卢、拓跋猗斤曾受封大单于、代王等称号。

经济上，鲜卑与中原朝廷开通互市，《后汉书》载：“永初元年，鲜卑大人燕荔阳，以阙朝贺，赐王印绶、居守城、通胡市”。

文化上，鲜卑人接受儒家思想，在迁徙过程中与匈奴、丁零、柔然、乌桓等部族通婚，如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、鲜卑与敕勒融合的乞伏鲜卑、鲜卑父胡母的拓跋氏等，同时也将匈奴、高车、柔然等纳入拓跋鲜卑“十姓”中。

纵观鲜卑人跨越地域与族群的迁徙，不仅是自身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抉择，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书，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历程中重要的一环。鲜卑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融入中原，同时带来了游牧部族的勇武精神、畜牧技术、音乐歌舞与民俗风情，让多元文化在碰撞中共生，在交融中升华，大力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（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员）

【史话】

骏影寻踪溯纹源

翼马即生着双翼的神骏，自秦汉时期的草原铜饰牌上扬蹄而起，穿过魏晋南北朝的烽烟、隋唐繁华的丝路，化作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文化符号。

先秦时期，亚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便开始崇拜马，随着草原商路的往来，西亚两河流域的翼神兽文化逐渐东传，与游牧部落崇拜的马相遇，催生出带翼神骏的形象。

东汉末年，拓跋鲜卑让翼马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传说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南迁途中，山高谷深、历经九难八阻，最危难时得到神骏的指引，才走出绝境。《魏书·序纪》中记载的引路神骏“形似马、声如牛”便是翼马纹的原型，从此，翼马成为鲜卑人的保护神，被铸进铜饰牌、刻在马具上。

翼马纹随着拓跋鲜卑的迁徙，迎来了第一次文化交融的浪潮。鲜卑人在中原建立北魏政权，翼马纹与汉文化碰撞，成为“天马”，象征祥瑞与力量。

随着北魏与西域的往来，中亚、波斯的艺术元素又为翼马纹注入了新的活力，原本粗犷的浮雕线条融入了西域艺术的细腻纹饰，羽翼的刻画从简单的线条变得有了层次感，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。

时至隋唐，繁华的丝绸之路让翼马纹迎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。此时的翼马纹不再局限于游牧部落的铜饰牌，还出现在织锦、壁画、金银器等多种载体上，成为丝路文化交流的标志性纹样。李白在《天马歌》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代翼马——“背为虎文龙翼骨，嘶青云，振绿发”。此时的翼马纹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缩影。

宋元之后，翼马纹逐渐融入了更广阔的文化语境，成为中华文明中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。在辽金时期北方草原的器物上，翼马纹依然延续着游牧部族的粗犷风格，而在中原地区，则更多以“天马”的形象出现在瓷器、绘画中，象征着对远方的向往与对祥瑞的祈愿。

历经千年的演变，翼马纹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，它的羽翼上承载着草原的风、丝路的沙、中原的光，见证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、多元共生的发展历程。

（高莉 供稿）